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陈铨

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第四辑）徐志福◎著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陈铨

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第四辑） 徐志福〇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陈铨 / 徐志福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09. 10

(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 第4辑)

ISBN 978-7-80752-445-8

I. 抗… II. 徐… III. 陈铨 (1903-1969) —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5121 号

· 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 ·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陈铨

徐志福 著

责任编辑	李 嘉 陈亚玲
封面设计	张 科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http://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电话: (028) 84122206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38mm×203mm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2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52-445-8
定 价	15.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总 序

张中伟

巴山蜀水自然风光旖旎，历史文化璀璨。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的巴蜀故地，历经数千年的风雨沧桑和一代又一代巴人蜀人的筚路蓝缕，形成了玄妙神奇、博大精深、瑰丽多姿的巴蜀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四川，乃至中国的一座极为珍贵的文化宝库。

巴蜀文化植根于巴山蜀水，是一种典型的地域文化。自上个世纪40年代初提出“巴蜀文化”这一概念以来，随着考古的新发现，特别是三星堆、金沙遗址等一批颇有影响的古迹相继发现发掘，巴蜀文化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并陆续在历史文化、考古文化和民族文化等方面推出了一批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的学术成果。这是我省文化事业繁荣兴旺的重要标志，是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瞩目成就。



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视发掘、研究巴蜀文化，大力普及、弘扬巴蜀文化，既是结合我省实际、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文化生活需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既是发展繁荣我省文化事业、建设文化强省的有机内容，也是加强和推进我省精神文明建设、振奋广大干部群众精神的重要途径。为此目的，省政府组织参事、文史馆员等一批学有所长的老专家、老教授编写了《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这套丛书涵盖了巴蜀文化的起源与传承、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科学技术、民风民俗、名都名城名人等诸多方面，史实准确，文字精练，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对普及、宣传和弘扬巴蜀文化，具有积极重要的作用。相信这套丛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并从中领略到巴蜀文化的独特魅力。

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弘扬巴蜀文化，既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又要大力开展宣传普及工作。坚持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希望全省学术研究和文化界的同志始终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文化精品，为推动我省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序 言

徐志福

在中国话剧史上，抗战时期被称为戏剧的黄金时代。

从1937年到1945年的八年间，戏剧运动的发展趋势尽管有些不平衡，但总体是呈空前繁荣、广泛普及的生动局面。

这一特殊现象，得力于民族存亡之秋的民族精神的高度凝聚所形成的团结合力。

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战军兴。全国大部分剧坛精英辗转来到武汉，出现各路“诸侯”风云际会的盛况。他们排除往日门户之见、派别之争，于当年12月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团结为了抗战，抗战促进团结”的口号下，以宣传效果好且快的戏剧做武器，积极投入为了民族解放的全民抗战行列。

首先是官方重视、支持广大剧人的爱国行动。其时，体现国共合作、以郭沫若为厅长、负责抗日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在成立之初就组建了十个抗敌演剧团和一个孩子剧团到前线和后方各地演出。

其次是民间自发组织的剧团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多得无法计数。单陪都重庆就有正式剧团（社）五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陈铨



002

十多个。演出剧目和演出人员之多都是史无前例的。

据有关统计，从1941年5月至1945年历时四届的“雾都公演”就演出话剧118部，投入专业人员（编、导、演职员）达15万之众。

民众对戏剧的积极参与和戏剧的广泛普及，从当时有名的“婆婆剧团”、“孩子剧团”、“农民剧团”可见一斑外，还体现在从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到大学校长、教授及中共在第三厅及其他部门工作的一些文化人士（如郭沫若、阳翰笙、田汉、夏衍等）都参加写戏、演戏。像1938年11月第一届“雾都公演”的“压轴戏”——大型反间谍抗战剧《全民总动员》，就有两百多位左、中、右人士参加演出（包括教育部次长、“剧专”校长等），真可谓“戏剧史上的空前盛举”。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的国难当头，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就是抗日救亡，压倒一切的主题就是歌颂军民反侵略、反汉奸、反妥协投降的斗争，就是写正面战场的直接抗日，这是人人都应该唱响的时代主旋律。应该说在这风云激荡的舞台上，人人都在戏里和戏外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就在这全民总动员的当口上，时在昆明西南联大的德国语言、文学教授陈铨博士，受全民抗战高昂激情的感染，积极提倡民族主义文学。并在火爆的话剧运动的强烈“刺激”下，利用教学之余，集编剧、导演、演员于一身（还搞戏剧研究），干起了戏剧事业，两年内，一口气创作了《黄鹤楼》、《野玫瑰》、《蓝蝴蝶》、《金指环》、《无情女》等一系列写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直接抗日的戏剧。或描写最残酷的战争，如南京大屠杀；或

叙写重要的战役，如轰炸台儿庄日军的军事设施；或讲述最惊险的斗争，如特工的反日锄奸等等。

也许是机缘转折，抑或是误打误撞，无心插柳柳成荫：本是业余写几部抗战戏的陈铨教授却成了剧坛一时踏浪弄潮的风云人物，像划过长空的一颗小流星，在经过短暂闪烁之后最终跌入深谷，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这缘自其创作的《野玫瑰》在演出之后引起的一场政治风波。

皖南事变后的1942年3月，原本脆弱的国共合作出现了危机，国共两党政治纷争变得日益尖锐，大有剑拔弩张之势。就在此时，歌颂国民党军队特工锄奸抗日的《野玫瑰》继昆明、贵阳演出之后，又在重庆隆重上演。演出火爆，上座率不错。作为“战国策派”的陈铨，在剧中强调的民族意识、国家民族高于一切的思想，客观上与国民党政府提倡的“民族文学”文艺政策不谋而合，至而被其视为至宝，予以嘉奖、宣传和推广。而部分左翼人士（非中共高层）也敏锐地觉察到执政党的政治用心而迅速作出反应：批评、抗议和抵制。文化意识形态上的两军对垒，各执一端，使既非国民党、更不是共产党的陈铨，因国民党高官的表态支持而陷入非常尴尬的困境，被人视为宣扬“一个党、一个领袖”、“为国民党文艺政策张目”的“策士”。

1942年对《野玫瑰》开展的那场批判，主要是小部分有“左倾”思潮的人怀着褊狭的政治目的，片面理解延安在皖南事变后采取“政治上全面攻势”的战略意图，故意歪曲《野玫瑰》的主旨，给剧作扣上了“汉奸文学”、“特务文学”的政治帽子。在当时，再尖锐的批



评也不过是文艺的批评而已，谁也没过多介意，剧作者陈铨大概连“教训”也没汲取。但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被推翻，政治话语权的变更，政治意识形态的日益强化、一系列政治运动灌输形成的“为政治服务”的思维定式的确立，就使得当代文学史家“背负着因袭的重担”（鲁迅语），不敢直面抗战历史现实，至而把文学史观建立在“新民主主义文学”论，甚至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基础上。体现在运用简单化、庸俗化的阶级分析方法去观照 20 世纪中国文学，其结果是：“战国策派”作为逆流的反动社团而存在，“民族主义文学”的政治正当性被否定，国民党军队抗日的正面战场被边缘化。国军（含特工）锄奸抗日作品要么被蒙蔽，要么被扭曲与批判。尤为严重的是照搬几十年前批判文章的一些草率结论。且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已经好几年，一位抗战文学史家的评判：“陈铨作为‘战国策派’的中坚，不仅系统地宣扬法西斯政治观和文学观，而且创作了体现这一观点的剧本，诸如《野玫瑰》、《蓝蝴蝶》、《金指环》。《野玫瑰》，众所周知，是在抗战旗号下歌颂特务、汉奸，纯属特务汉奸文学之列。”^①所谓“众所周知”，就是 1942 年那场批判。几顶帽子都是那时戴上的，顺手拣来，不犯错误，因为 1949 年后，有人指责抗战文艺“右倾”，不正好反衬当年批判的正确么！

这种对艺术批评的形而上学的把握，特别是用一种

^① 苏光文：《抗战文学概观》，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157 页。

价值尺度、同一标准来衡量艺术作品，其恶劣影响是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由于否定了对于艺术活动的全部流程和全部环节的评判，就等于否定了彼时彼地社会的主流价值，就失去了评判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不顾客观史实，片面地、功利主义地去解读评判历史，其误导的恶果是歪曲事实真相，使读者离历史的真实越来越远，而且会持续地影响一代又一代在历史认识上矛盾对立的糊涂读者。

作为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秋的战时文学，其相对的客观标准是：作品是否符合特定社会、民族与大众的精神需求，以及共同关注的问题和共同的愿望；是否是国家民族、人民大众普遍的价值取向。

本着这样的观点，笔者试图通过考察陈铨的身世及其与“战国策派”的关系、其所持的文化哲学理念，进而考察他在抗战时期所写《野玫瑰》等一系列戏剧的旨意及《野玫瑰》风波的前因后事，试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给陈铨讨个稍微公正的说法。本书的立意除上述意图外，还秉承以下旨意：

“21世纪，世界文化正面临一个新的转折。为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必须大力推进多极制衡和文化的多元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对传统文化进行诠释，以利于其现代发展并有益于世界进步。”^①

这无疑是我们文化人努力的方向。

^① 季进、曾一果：《陈铨异邦的借镜·总序》，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1页。



目 录

总 序	张中伟 001
序 言	徐志福 001

第一章 陈铨概说：清晰的一生与沉重的二十年 ... 001

一、从传统出发	002
---------------	-----

二、清华才子	007
--------------	-----

三、留学美德 学贯中西	009
-------------------	-----

四、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构建民族主义文学 ...	012
---------------------------	-----

五、沉重的二十年	024
----------------	-----

第二章 陈铨与“战国策派”的前因后事 029

一、“战国策派”出台前后及主张	030
-----------------------	-----

二、“战国策派”遭遇大批判：“三套马车”被颠覆 ...	034
-----------------------------	-----

三、民族主义文学：陈铨的政治抱负与文学理念 ...	040
---------------------------	-----

四、“战国策派”的文化反思	044
---------------------	-----

第三章 陈铨的戏剧研究及抗战时期戏剧创作综述 ... 047



一、陈铨的戏剧研究及戏剧理论探微	047
二、牺牲儿女私情 献身国家民族 ——陈铨抗战时期戏剧创作浅析	051
第四章 《野玫瑰》风波及历史伤痕	070
一、《野玫瑰》素材及创作动因	071
二、情节、人物、主旨	075
三、《野玫瑰》出台的时代背景	085
四、两军对垒、各执一端：奖励与批判	089
五、《野玫瑰》主演秦怡等“罢演”始末	106
六、阳翰笙与《野玫瑰》	113
七、难以愈合的历史伤痕	122
第五章 新世纪的期许	130
陈铨生平创作年表	136
后 记	徐志福 168



第一章 陈铨概说： 清晰的一生与沉重的二十年

近年，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陈铨走进了学术界和大众评论的视野。

陈铨何许人，有何业绩？年轻朋友面对这个陌生的名字，自然会发出不解的疑问。前些年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中年朋友见复出于报刊的这个名字定会生出诸多惊讶：陈铨！不是“战国策派”骨干，那个反动作家吗？他那歌颂“汉奸”、“特务”，宣扬“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剧本《野玫瑰》不是被批透、批臭，被钉在现代文学史的耻辱柱上了吗？难道被拨乱反正——平反了？而从抗日战争走过来的人则更多的是惊叹：好啦！历史终归恢复了本来面目，既然承认国民党军队参加过抗日，且是正面战场的主力，那颂扬国民党军队特工锄奸抗日的话剧《野玫瑰》怎么会是汉奸、特务文学呢？

既然话闸打开，那就得从头说起。这对我们了解本书主人公抗战时竭力倡导民族主义文学、积极创作弘扬民族意识戏剧不无助力，或者说是入门的向导。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陈铨



.....

002

一、从传统出发

陈铨，名大铨，号选卿。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八月初五（9月25日）出生于四川自贡富顺县城内盐井街。

地处川黔边境的富顺，位于沱江下游，是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大县。它西通滇、黔，东连泸、叙，是沟通几省的重要关隘，也是边区的物资集散地。因产盐出名的自流井也在境内，故有“金犍为，银富顺”之说。同时，因盐业的销售渠道把外界和富顺连接起来，虽偏僻而不闭塞。其民风淳正、质朴，素有崇尚知识的优良传统。对于故乡，陈铨在1922年（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时）写的《乡土风俗记》有一段精彩描写，足见乡风民俗对其影响之深：

……吾乡地处蜀南，县名富顺。出城而北十五里，土地饶沃，林木菁然。江水带其前，小山绕其后，有一村曰双桥子，即吾家之所在也（指老屋，在今共和乡团结村）。村中凡六七百家，务农者的十之七，工商十之二，读书造学者十之一而已。民俗尚纯朴，望杏瞻蒲，犁云锄雨，不知有人间事。每当秋获之后，家人团坐，笑语声喧，野老牧童，歌讴道中，儿童书声，忽达于耳。几与武陵桃园无异也。乡中之所注重而庆贺之者，厥惟新岁（指过年）。此时虽至贫者亦必购酒肉、著新衣，虽典衣售物不计也。每家门首，均必贴新楹联、悬灯彩，又有所谓龙灯、狮灯、马灯绕村而呼，鼓声震天，欢声不绝。自初一至十五日始止，岁以为常。

故乡不仅是桃花源，还有另外一面。由于陈铨 16 岁前都浸泡在浓郁的乡风民俗中，耳濡目染，感知既深，其认识也就超乎一般青少年，且看他在《乡土风俗记》中最后的描写：

无如近年以来，川战频仍，兵匪充斥，筹款抢劫，纷至沓来。于是富者转为贫，贫者遂不聊生矣。纯朴之俗，一变而为狡诈之风矣。而诚笃者流，束手无策。

这种因兵匪扰民至而使世风日下的忧虑也是对故乡无限热爱而表现出的一种无奈。陈铨的思乡情结全部释放进他后来写的长、短篇小说中。在美国、德国留学期间，乡愁难遣，怀着深厚的乡恋写下《天问》、《彷徨中的冷静》，抗战初期回国又写下《狂飙》，都是以富顺的风土人情，甚至具体到富顺西湖、第一山等名胜为背景展开故事，至而连家里的中药铺也成为人物活动的场景。当然，这时陈铨的恋乡情怀已上升为民族主义思潮和意识，正面人物形象已成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笔者认为要认识陈铨先得从这里出发。

陈铨所处的家境和所受的启蒙教育对其成长至关重要。

因经商从广东迁来富顺的先祖在城郊购置了田产，城内经营商铺，生活比较优裕。父亲陈智府，光绪六年（1880）考取了第十六名附生（秀才）。除熟悉“四书”、“五经”外，还精通医学，经营一家不错的药铺，以传统的诗书经传教育子女。11 岁前，陈铨都在家读私塾。家庭教师是一位当地著名的肖姓秀才，以“四书”、“五经”、唐宋诗文做教材，在古典诗文知识方面对陈铨进



行过严格训练。陈铨聪颖过人，常过目不忘。

陈智府比较重视旧学，但不死守旧规。1914年，古文知识已有相当基础的陈铨试着去考城内高小插班生，竟以第一名被录取。到开学时还未报名。校长李荣先不忍舍去这个难得的学生，便动员陈父，阐明新学重视科学知识的种种道理。陈智府开初怕孩子古书读得少，将来毫无用处，但经李校长一说也就放心了，但还保留让其晚上读古书的规定。为此，还先后请过三位先生在夜里专门教陈铨诸子古籍和诗词知识。可以想见，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一天要读新、旧两种截然不同的书，且白天夜晚不辍，这要靠兴趣更要靠毅力来支持。陈铨二者兼备，从不厌学、逃学。

浓郁的乡情及传统文化的滋润熏陶，使陈铨对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有较深切的体验和认知。在诗书经传的教化中，在父母、师长、乡人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忠孝仁爱的立身之道逐渐在陈铨童年心中形成。这就是陈铨一生魂牵梦绕的故乡在他身上孕育的禀赋。由热爱故乡，孝敬父母升华为热爱国家和民族，这是我们认识陈铨的一条基本思路。

在陈铨所有写故乡、亲人的多部纪实作品、诗词中，孝子陈铨的形象让人难忘。1928年，25岁的陈铨即将赴美留学，但他最放不下心的就是年迈的双亲。明月高照、蟋蟀鸣叫的夜晚他睡不着觉，想起了家乡的父母，且看其《思乡》一诗中的描绘：

蟋蟀鸣四壁，明月照我床。辗转不能寐，频忆我家乡。高堂有老父，鬓发今已苍。慈母素多病，念念不能忘。七载不相见，分手各一方。犹记临行

时，心中满悽怆。……从今须努力，岁月莫蹉跎。

1939年8月，时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授的陈铨回了一次故乡，陪年迈的父亲在家住了几天，其时母亲已过世，且看他在《和父亲伴游周甲》诗中所述：“谁料儒冠误此身，难将菽水慰双亲。伤心此日重回里，庭院凄清只一人。”而面对家道中落而满头白发的父亲，他凄楚地吟道：“几度还乡岁月迁，高堂鬓发已皤然，文章父子心心印，愿结来生未了缘。”

一位对家乡、对父母爱得如此深沉的人也必然会对国家、民族持有执著、诚挚的爱，这对我们理解认识陈铨后来顽强地倡导民族主义文学，以写小说、戏剧拼力宣扬民族意识，抒发民族情怀提供了一把钥匙。

另一件事是对待“早订婚约”的态度上，陈铨虽婉拒而并非“铁面无情”，处理得很有分寸。1919年，他以高分考进四川省立第一中学。不久，家中就为他选择了“对象”（肖颜舜），下了聘礼，在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社会，这就算“铁板”婚姻，无法变更了。

陈铨要出国深造，成就一番事业，不想过早结婚妨碍学业，虽不同意但未提出解除婚约。



1919年，16岁的陈铨考取四川省立第一中学时留影